

主编：沈志华 杨奎松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



第三编 中国政治

主编：张民军

第四编 中国经济

主编：姚 显



东方出版中心

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007DTQ001）
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406）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



第三编 中国政治

主编：张民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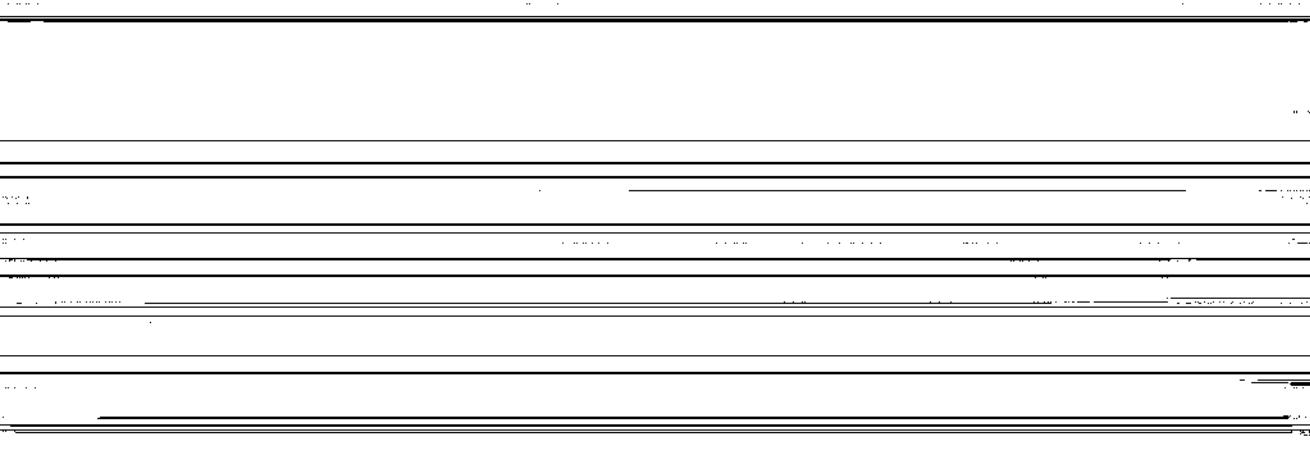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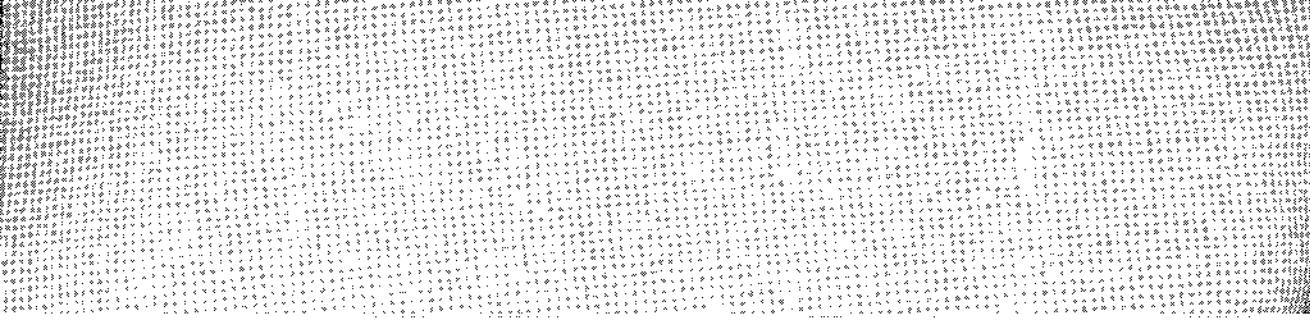
第四编 中国经济

主编：姚 呈



东方出版中心

第三编 中国政治



目 录

导论 张民军 / 5

第一部分 建国之初的政治运动与社会状况

- 3-1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的新闻自由的备忘录(1951年4月17日)/17
- 3-2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朝鲜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国内压力的报告(1951年12月28日)/20
- 3-3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报告(1952年3月12日)/23
- 3-4 国务院关于中国的“批斗会”的情报备忘录(1952年4月21日)/29
- 3-5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本土的佛教机构及其基本情况的报告(1952年9月24日)/33
- 3-6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开展的“仇美”宣传运动的报告(1953年1月15日)/46
- 3-7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采取所谓的逼供方法的报告(1953年2月19日)/61
- 3-8 国务院关于新中国政权性质分析的备忘录(1954年5月14日)/70
- 3-9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佛教政策的情报报告(1955年11月10日)/75

第二部分 政权机构的调整与政权的稳定性

- 3-10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1952年中国政府机构调整的分析报告(1952年12月5日)/76
- 3-11 中情局关于中国领导层与接班问题的分析报告(1964年3月20日)/82
- 3-12 中情局关于中国领导人健康状况的情报备忘录(1964年10月27日)/91
- 3-13 中情局关于中国政治问题及其前景的评估报告(1965年8月5日)/93
- 3-14 中情局关于中国领导层人事变动的情报备忘录(1966年6月17日)/100

第三部分 民众的态度及社会控制

- 3-15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秘密讲话的分析报告(1957年7月1日)/110
- 3-16 中情局关于1962年5月广东边民外逃香港事件的研究报告(1965年2月23日)/117
- 3-17 中情局关于1960年“信阳事件”的研究报告(1965年9月17日)/126

- 3-18 中情局关于中国的异议与反抗潜力的研究报告(1965年12月7日)/138
- 3-19 中情局关于中国民众的态度与士气的特别报告(1965年12月17日)/152
- 3-20 中情局关于中国“压迫”知识分子的特别报告(1966年4月8日)/157

第四部分 中国的发展政策及其趋势

- 3-21 中情局关于中国大陆1950年可能发生饥荒的分析报告(1950年2月3日)/165
- 3-22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1952年发展趋势的分析报告(1953年2月4日)/168
- 3-23 中情局关于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的预测分析报告(1959年9月1日)/171
- 3-24 海外情报活动总统委员会关于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及美国对策的报告(1960年5月23日)/182
- 3-25 中情局关于中国1961年局势的分析报告(1961年7月27日)/188
- 3-26 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关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粮食危机及其影响的研究备忘录(1962年7月9日)/192
- 3-27 中情局关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思想与实践的特别报告(1963年5月24日)/201
- 3-28 中情局关于新中国成立15年来国内政策走向的分析报告(1964年7月31日)/205

导 论

张民军

本编收入的文件共 28 件,时间跨度为 1950~1966 年,其中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报告有 13 篇,来自中情局系统的情报报告有 15 篇。这些报告形式各异,既有情报备忘录,也有情报分析报告与评估报告,涵盖的内容五花八门、时间跨度很大,多数文件之间的联系性很弱,更无系统性可言,但出于资料整理及研究的方便,编译者按文件的内容粗略地分为四组:(1)“建国之初的政治运动与社会状况”(9 篇);(2)“政权机构的调整与政权的稳定性”(5 篇);(3)“民众的态度及社会控制”(6 篇);(4)“中国的发展政策及其趋势”(8 篇)。下面对这些文件逐一进行分析。

一、对“建国之初的政治运动与社会状况”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创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与进行社会改造的繁重任务。1950~1952 年在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月发起了“抗美援朝”运动,1951 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 年冬至 1952 年进行了“三反”(反对政府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与“五反”(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开展的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活动)运动。面对新中国的这些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美国情报机关的报道与分析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对新政权充满敌视与偏见,并为他们在中国失去的地位与特权倍感失落。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在对新中国的新闻媒体进行分析时,就武断地认为中国的新闻界缺乏自由。本编 3-1 文件认为,由共产党员掌控的新闻总署通过新华社对新闻媒体实施垄断,全国的报纸必须采用新华社发表的消息,于是各种报刊的消息都千篇一律。诚然,中宣部、新华社于 1949 年 8 月 25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布战报的指示,规定凡关系全国性的重大事件的公告、新闻、言论的发布,必须先发给新华社,由新华社广播或事先请示中央求得同意再得以发表。^① 其实这些措施与规定的出台全是出于保护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多数带有军管的色彩,不能用和平时期的所谓“新闻自由”的标准来诋毁这些强制性措施。该报告同时认为中国报刊的数量在急剧减少,西方人熟知的《字林西报》也被迫关闭;一些新闻从业人员以“文化帝国主义”、“造谣”、“间谍”和“与人民为敌”等罪名受到惩处。关闭前政权的一些报刊与外国媒体是新生政权的必要措施,对敌视新中国的西方媒体固然绝无自由可言,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例如 1949 年 10 月 6 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自即日

^① 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录》第一卷(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 页。

起,凡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各外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在上海的记者,无论其为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① 在禁止西方记者活动的同时,苏联塔斯社北京分设宣布成立,所以中国的政策是有针对性的,是与当时对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战略相辅相成的。

关于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本编 3-2 文件认为朝鲜战争带给中国经济特别是财政巨大的负担,后勤上的需求已对中国的铁路系统造成沉重压力,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在 1950~1952 年间,中国的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38.19%、45.64%、32.23%,经济建设支出被挤到第二位。^② 但该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影响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牵强,认为继续战争会在党的领导层内部引起或加剧潜在的分裂,苏联会介入中国国内政策,公众对政权的敌视加深。实际上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政策,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信心,对新生政权的巩固功不可没。

本编 3-3 文件对“三反”、“五反”运动过程的叙述相当准确,这是因为该报告大量引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基本没有出入。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该报告称:“中共的这个计划就是摧毁之前的中国社会‘基础’。该运动也意欲在中国促进一个新社会的‘建设’,提高民众对政权计划的响应,实现政府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最大化;而且认为这次运动最具决定性的影响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伤,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中国私商进行孤立与恐吓。”这些分析基本合情合理,“三反”、“五反”运动本身就是新中国从国家机关与私营工商业两方面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在经济、政治与思想上的一次打击,它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为国家计划性的经济建设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在建国之初的各类运动中,特别是在土改、镇反、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以及“三反”、“五反”运动中,动员群众开批斗会是惩处、教育、改造旧社会的各种黑恶势力及其成员的一种普遍实行的方法。本编 3-4 文件认为:“(把批斗会看作是)对个人的一种外在控制手段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的目标更为深远——向个人灌输一种精神狂热,造成一种实际的皈依,而正是这种狂热与皈依将使它希望把个人的愿望服从于那些法则并由此服从于国家或党的目标。”这种分析倒也符合实际,简言之斗争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正如亲身参加土改斗争大会的知识分子朱光潜坦言:“斗争大会的场面是一种情感教育。在这种场面,任何人都要感觉到心像浪一样,要经过几起几伏的情感的激动。我分析我每次当场的情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是站在贫苦农民方面,把地主阶级当作对面的敌人来仇恨。……像这样情感的变化不是读书听讲所可得来的,它必须由实际斗争经验才能体验到。”^③

本编 3-5 文件是一篇冗长的资料汇编,详细论述了大陆佛教(不包括喇嘛教)在民国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上),第 62 页。

^② 范志凯主编:《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5 页。

^③ 朱光潜:《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光明日报》1951 年 4 月 13 日。

间的发展趋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情报系统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谓入木三分。本编 3-9 文件则专门谈及新中国的佛教政策,认为:“尽管中共宪法含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条款,北平对宗教的政策却是削弱宗教组织的权力和影响,并将其置于严格的国家控制之下。为此中共已系统地渗入佛教机构,并以各种手段来极力削弱传统佛教机构和组织的影响。”这种论断是对新中国宗教政策的一种误解与歪曲。在 1949 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5 条与 1954 年宪法的第 88 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实践中则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宗教,因势利导,进行宗教革新与民主改革。新中国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民主改造,征收了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的封建土地,废除其封建特权,改革宗教制度及教义,组织僧道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实现自食其力等。

新中国在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加之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与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所以处处学习苏联“老大哥”。于是西方学界与情报界在分析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及其行为模式时就以“克里姆林官学”(Kremlinology 或译为“苏联问题研究”)为圭臬,到处套用所谓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模式。本编 3-8 文件宣称:“北平政权已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模式的极权警察国家,通过该政权,包括共产党精英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就能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 5.75 亿中国人身上。在四年半的统治中,中共政权已把中国大陆置于一个统一的、苏联型的专制政府之下,并且制定旨在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控制的措施。”在另一份 3-7 文件中则通过那些被新中国驱逐出境的西方传教士、教师、律师、外交官的一面之词,以所谓的“逼供”为契机,从更细致入微的方面来证明“中共在逼供中主要遵循苏联的技巧,但他们在发展被称为‘洗脑’的方法中已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新花样”。这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情报机关妖魔化中国的常用手段。

本编 3-6 文件更是详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战后反美运动的全过程(1945~1953),该报告把中共的反美运动分为四个阶段,以 1949 年以来反美运动的演变为重点,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仇美”一直是国内的十次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爱国公约运动、为朝鲜战争购买飞机大炮的捐献运动、救济帮助军属运动、大生产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细菌战运动)的宣传主题,这些仇美主题多达八种,宣传方式五花八门,规模空前。该报告不无忧虑地预言:“迄今,中共政权在诱导中国人民与亚洲其他地区仇美亲苏的这场运动只获得了部分成功。然而,由于中国人民与外部所有的非共产党信息与体验的隔绝,加之中共政权强烈的反美宣传活动终究会使共产党完全摧毁过去一个多世纪在中国与远东累积形成的对美善意。”报告中罗列的事例多数来自当时中国的报刊广播,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反美宣传实属过火,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在中国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主权、宗教主权的民主化改革时期,这场反美运动彻底消除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提高了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实质上是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二、关于“政权机构的调整与政权的稳定性”的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加强中央政府的集中

统一领导,于是从1952年6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对整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党政系统作大幅调整。^①8月,“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被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11月14日的政务院第158次会议决定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统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高等教育部等,其中国家计委的职能是指导中央各部及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制订经济文化事业的长期与年度计划,^②所以国家计委又被称为“经济内阁”。本编3-10文件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中共对国家机器进行重大改组,增设国家计委、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的机构与任务,旨在准备国家计划,“加强中央集权”,从军管向民管转变。

不过从现在解密的美国情报文件来看,有关中共领导层的稳定问题与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是美国情报机关分析中国政治的一个焦点。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情局就在其《国家情报评估》与《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s)的系列报告中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连续的分析与预测。^③本编集中收录了1964~1966年间中情局对中国最高领导层加以分析的四份文件。

1964年3月本编3-11文件指出:(1)中共的领导层是相对稳定的,高层的变动很小;(2)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分为两派,即刘少奇与邓小平领导并得到毛泽东青睐的激进派(或曰教条主义者)与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或曰实用主义者),激进派近年来明显占据主导地位;(3)领导层日益年迈多病,特别是认为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4)毛泽东的接班人顺序是刘少奇、邓小平,而中共下一代接班人则是一个多达800人的更加保守的第二梯队。尽管这些观点对错参半,却是中情局对“文革”之前的中国政局进行分析的核心观点。

同年10月本编3-12文件则更详细地谈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及其可能患有的疾病,例如说毛泽东有心血管方面的毛病。虽然当时中国党政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属于最高机密,但中情局还是运用各种方法来分析推测,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接见过的外宾的印象,领导人公开露面的频率及其神态以及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事实上毛泽东晚年多病,患有慢性气管炎、白内障、肺心病、脑血管疾病等老年人的常见病,^④显然中情局的那些推断基本上符合实情,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中情局强大的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虽然该报告谈论的是中共领导人的健康问题,但言外之意还是指向了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共领导层的稳定与接班问题。

1965年8月本编3-13文件继续就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分析与预测。关于接班人问题,该报告认为领导层日益年迈多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是毛泽东的潜在接班人,林

^① 《为了解联共关于中央机构设置的经验给斯大林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62页。

^③ 详见本书“第一编 中国综合状况”。

^④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98页。

彪因长期健康欠佳则不太可能接班；关于国内政策问题，该报告认为自“大跃进”失败以来，领导层的革命目标与人民群众的目标之间的分歧日渐扩大，现在的领导人愈益“教条与顽固”，面对群众的政治冷漠，政权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强制改造和教育群众接受其集体主义的计划，其结果是加剧紧张状况。

在“文革”初期，面对中国领导层的剧变，本编 3-14 文件对 1965 年 9 月至 1966 年 6 月期间中共领导层的变动及其未来趋势做了分析。该报告认为随着彭真的倒台，中共将开始一场真正的“权力斗争”，而且认为这可能是毛泽东时代谢幕的开始。关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动向，报告认为毛泽东可能丧失了能力，其地位似乎已被削弱，其目前的角色是不确定的；刘少奇的地位正在被削弱，其党内的地位已经下降；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似乎要取代刘少奇而成为显然的接班人；周恩来似乎在设法远离斗争；而林彪不可能是一位最高权位的竞争者。报告还认为如果这场斗争的过程是漫长的，它将演变为混乱。中情局的这些分析良莠不齐，对错参半，特别是关于邓小平与林彪在“文革”初期的角色分析显得很荒唐，实际上邓小平很快就作为中国“走资派”的第二号人物而被打倒，林彪则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史无前例地写入党章。当然这份报告也有令人称奇的论断：诸如“相信一场争夺毛泽东衣钵的斗争已经爆发，而且将一直斗到毛最后逝去而其接班人能够巩固权力时为止”；“领导人间的斗争主要围绕权力而不是问题，其公开表现形式体现在绝对的革命纯洁性与对毛泽东思想的绝对忠诚方面”。我们相信将这些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编”中的相关文件联系起来阅读会更有裨益。

三、关于“民众的态度及社会控制”的分析

1956 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事之秋”，从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到波匈事件的爆发，都给国际共运带来巨大的冲击，也进一步促使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做了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秘密讲话，认为中国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摆在第一位，认为中国的局势只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3 月 1 日，毛泽东在《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当允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①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鸣放”问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问题进行说明。

本编 3-15 文件对毛泽东 2 月 27 日的“秘密讲话”评价甚高：“北平于 1957 年 6 月 18 日发表了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秘密’讲话，该讲话是他自 1949 年以来主要的思想声明，将在共产主义阵营中产生重大的反响。虽然在为发表而对讲话进行的修订中，毛已大大减弱了其论点的新颖性，他的论点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人民与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1 页。

盾’，他坦白承认中国共产主义体系中的弱点。”的确，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明确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没有注意到当时中国正在开展的“反右”斗争。反倒是中国局 1965 年 12 月 7 日本编 3-18 文件弥补了这一缺憾：“北京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近乎表面的反共情绪的强烈程度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它错误地相信依靠在许多机关，包括学校中的干部就可以把批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领导人自身在应对其邀请所激起的始料未及的反应时，就显出了最初的慌乱与怀疑。最后，当局在反右运动中显然要努力认定反抗的背后有一个组织和阴谋，并极力指责某些杰出的非共产党人士领导了反抗，这显示出北京在这一事实上的尴尬，那就是如此多的异议人士能够在同时，以相同的方式自发地行动。”近年来学界关于 1957 年“反右”运动的研究基本上证实了中国局的上述论断。^①

中国局的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研究中国社会各阶层与政府间的关系问题。该问题涉及三方面：(1) 民众对政府(用美国情报机关的话来说就是中共政权)的态度，(2) 政府对民众的管理与控制方式以及(3) 民众反抗及政权的异己力量对政权的威胁程度。他们期望从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来判断中共政权的稳定性。在其中的一些情报报告中，中国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又将民众细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基层党员干部、军人等不同阶层，分别对这些阶层加以详述。本编就收录了五份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中国局的相关文件。

本编 3-16、3-17、3-18 文件是中国局关于中国的“异议与控制”的三份系列研究报告，旨在关注中国社会存在的消极与积极反抗以及政府的应对之道。正如本编 3-18 文件所言：“除了在西藏、新疆及其他一些省份出现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反抗外，在共产党中国已经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体反抗事件。这三个群体牵涉到——知识分子、青年与农民，虽然每个事件都不相同，但它们均有共同的主题。”

本编 3-16 文件分析的是 1962 年 5 月广东出现的大规模偷渡香港事件，该事件被海外媒体称之为“五月大逃亡”。^② 该报告分三部分：(1) 广东边民外逃事件的起因(粤港移民的背景、1962 年削减城镇人口的政策与广州的人口压力)；(2) 五月大逃亡的过程；(3) 外逃事件折射出的异议本质与政府的应对措施。该报告认为“1962 年 5 月从广东省向香港的大规模逃亡是一个突出的不容置疑的例证，即异议情绪在华南那个人口稠密的地区是普遍的，并无疑已表面化了。这些异议主要源于广东省业已存在的严重经济状况，但逃亡本身是由极少数情形中的一种所导致，在这种情形下，严格管制被故意放开。这次逃亡达到其显现的程

^① 逄先知认为，毛泽东原来的估计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执政业绩，中国不会出匈牙利事件，他真诚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形成党内外的压力，促使各级领导正视错误，迅速改正缺点，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情况，使毛泽东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06 年第 2 期，第 32 页。亦可参见沈志华先生的相关论述。

^② 东山涛：《“文革”前后粤港偷渡风》，《检察风云》2007 年第 12 期。

度则源于北平当时对地方当局实施的监督相对宽松。”

本编 3-17 文件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信阳事件”发生的背景与原因，指出河南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导致群众的不满转变为公开的反抗，报告大量引用河南当地的报刊，史料翔实；第二部分是所谓的“反抗”，即信阳地区社会秩序的崩溃；第三部分是“控制”，即政府派驻军队帮助地方恢复社会秩序与发展生产。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该报告的资料来源，报告声称所谓的“西藏游击队”（即西藏叛乱分子）在 1961 年末获得了解放军的一批秘密军事文件，正是这些文件披露了 1960 年秋河南农村地区发生的严重的治安失控事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份报告可以帮助国内学界了解美国关于“信阳事件”的看法。^①

本编 3-18 文件是关于中国的“异议与控制”研究系列的总结。该报告对新中国在建国后的十余年间所遭遇的三次大规模反抗（它们分别指由知识分子与学生参与的 1957 年的“鸣放”运动；1960 年在河南发生的“信阳事件”，主角是农民；1962 年 5 月出现的广东边民逃亡香港事件，主角是青年）进行了比较研究，归纳出这些反抗事件的一个共同历程：基层控制的薄弱状态——群众不满与异议情绪的爆发——政权反应的迟滞——政权的“镇压”——反抗的销声匿迹。报告认为这些反抗没有对政权造成严重的威胁，群众中的异己分子对武力“镇压”的威胁极度敏感；虽然这些反抗是消极的无组织反抗，但它显示了中国大量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青年与农民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利用政权控制机构的基本弱点来协同行动。同时该报告也详细分析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之策，即在青年中开展“学雷锋”活动并加强共青团的工作；对知识分子则进行政治灌输与思想改造，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唤醒农民的冷漠。

本编 3-20 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情局关于中国的异议与反抗潜力的研究报告》的一个补充，该报告集中讨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的批判运动。报告指出：“目前反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源于 1962 年 9 月的十中全会所做的决定”，“北京的目的是全面的思想控制——用毛泽东的粗糙的、原教旨主义的哲学教导全体知识分子——但在这方面，政权是失败的。虽然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心态知之甚少，但现在的所知表明许多人或多数人对中共深感疏远与不满”。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学术领域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大陆官方对文艺、经济、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工作、观点与代表人物纷纷进行错误的政治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严重妨碍了中国文艺事业与科学的研究工作的发展。

本编 3-19 文件应该说是关于中国“异议与控制”系列研究的扩大，该报告关注的对象

^① 有关“信阳事件”的成因、发展与处理过程在当代史、特别是有关河南的地方史志中论述极多，也很详细。代表性的论著有：张树藩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9 年第 12 期；李锐的《“信阳事件”及其教训——〈信阳事件〉序言》，《炎黄春秋》2002 年第 4 期。

不仅有农民、青年、知识分子，还进一步分析了党的机关与武装部队对政府的态度及其士气。该报告认为：“直到 1958 年，北京政权一直得到多数中国民众的普遍赞同。自‘大跃进’的失败与 1959~1961 年的经济灾难以来，领导层的革命目标与人民的目标间的分歧已经扩大，后者的目标是‘个人的、实物主义的’。政权能够博取顺从与服从，但它不能从群众的政治冷漠中唤醒他们。领导层意欲重新采取一些措施来恢复以前的革命锐气，并为此目的一直在开展持续与强烈的‘政治灌输计划’。目前，这些计划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四、关于“中国的发展政策及其趋势”的分析

中情局最初的情报评估是由报告与评估办公室(ORE)提供的，不过其评估经常集中于短期分析而不是长期预测。入选本编的 3-21 文件就是一例，该报告分析由于 1949 年的普遍干旱与洪灾可能会导致中国大陆在 1950 年发生严重饥荒，不过它也承认虽然农村地区的动乱可能会妨碍中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但不会对共产党政权造成严重威胁，共产党也不会寻求美国或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援助。

到 1952 年，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并开始了部分重点建设项目，到年底又对国家的行政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本编 3-22 文件对大陆 1952 年的发展成绩——党的建设、“三反”、“五反”运动、农村互助组的建立与政府的重组——予以充分肯定，指出：“在 1952 年期间，中共政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创造一种国家活力的局面，这种活力能使中国继续承担朝鲜战争的负担，同时为国家计划和工业化的一个未来规划奠定基础。”

本编 3-23 文件写于国庆十周年前夕。该报告充分展示了中情局专家的预测能力，正如报告的序言所示：“在讨论北平庆典的各种可能时，我们应既明确又模糊地提出我们自己对中共政权历程的评估，对其近来与长远的未来进行预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本报告是一篇用推测性评估的笔触加以写就的论文，这允许对一件即将来临的事件给予无拘束的预言。”报告从国际共运(特别是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解放与政治统一、对中共的赞颂、中国军事力量的展示、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的变化等六个方面来预测与分析国庆十周年庆典，报告认为这是一次对中共及其在十年内所取得的成就的一次赞颂，对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赞颂，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团结与活力的一次展示。诚然，中情局的这些预测基本上“应验”了：1959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中国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以苏联为首的 11 个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与 60 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参加庆典。在国庆前后，刘少奇、周恩来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伟大的十年》，高度评价了新中国成立的巨大成就与历史意义。该报告立论的一个基础是：“单个共产党国家的外交政策服从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更高目标。我们相信，苏联或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均不会承认在传统上被视为的‘国家利益’与从事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胜利的活动之间存在任何根本冲突。”但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并非没有矛盾，中苏两党两国间的矛盾竟在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参加十周年庆典之际爆发。10 月 2 日，在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双方就在释

放五名中国监禁的美国犯人问题、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尽管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①，但中苏两党间的裂痕却在进一步扩大，这也是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始料未及的。

本编 3-24 文件写于 1960 年 5 月，该报告通篇都是中国威胁论，认为“红色中国日益显现的力量和影响为美国和自由世界提出了一个愈加危险的问题”，却对中国“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视而不见，所以其结论经不起考验。但其报告的后半部分则是美国已经或将要采取的针对中国大陆的庞大情报计划，也许上述夸大中国威胁的论调正是为了让“美国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和推动那些旨在影响红色中国发展并抵制其在海外扩张影响的行动”。

本编收录的 3-25、3-26、3-27、3-28 最后四篇文件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3-25 文件只是对中国 1961 年的国内经济与社会形势进行分析，其论断是客观真实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正处于严重的国内困境之中：粮食供给不足，苏联专家的撤离与经济管理不善，工业化计划严重受阻，公社试验已经中止，外汇几乎耗尽，民众士气处于 1949 年以来的最低点，干部和地方官员中出现了纪律松懈的现象，献身精神低落，公开反抗地方政权的事件也零星出现。

3-26 文件集中分析中国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粮食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中国的人口-粮食危机的办法，即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该报告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是革命的十年、幻想的十年，而 60 年代则是重建的十年与幻灭的十年，中共必须采取温和、稳定的补救措施，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才能摆脱困境。但实际上中国的内外政策在 1962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更加“左倾”，该报告设想中国大陆会专心于国内事务，在外交上采取一条更温和的路线，这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厢情愿。

3-27 文件继续就“大跃进”失败后的中国经济思想与政策进行梳理，指出中共寻求解决迫切的经济问题已历经了三个明显的阶段：1960 年末和 1961 年的削减开支阶段；1961 年末到 1962 年夏是经济自由阶段；1962 年 9 月后是自由主义的倒退与社会主义正统的回归阶段。虽然报告认为现在政策的走向（后退抑或又一次“大跃进”）还不确定，但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层似乎坚定地相信严厉的政治指导的效力。

3-28 文件长达 190 多页，本编的译文仅仅是“摘要与结论”部分，正文部分并未翻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全文的解读。该报告也是这四篇报告的点睛之篇，它完整地论述了 1949~1963 年 12 月期间中国国内政策的发展历程，归纳出 15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就是“跃进”——退却——“大跃进”——“大退却”——经济调整——“大踏步前进”（受控的跃进）。报告认为：“在对共产党中国的国内政策之未来方向的评估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毛泽东及其副手们从其经济发展的‘跃进’方法的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已吸取了一些教训，但他们并未学到最重要的教训——即‘跃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15~1016 页。

战略本身是有缺陷的——而且他们因而可能发动另一次‘跃进’，或许就在1966年。”可惜中情局的这个预言被不幸言中了，1966年开始的“文革”就是这种“跃进”战略的极端体现。报告还认为中国的国内政策走向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另外毛泽东倡导的看法与政策在中国的国内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至关重要，即该报告所言：“对共产党的国家发展政策的任何评估必须集中于毛泽东的人格与观念，他已承担起一个现代列宁的角色。”而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总是呈现大起大落的局面，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源于“跃进”战略本身的局限性，这也是值得中国学者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主题。

余 论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美国情报报告已经是四五十年前的文本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研究这些文本时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尽量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而不是采取“后事之明”态度，以一位当代中国学人的眼光，以冷战结束将近20年后的新增语境来苛求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尽管在对上述各个文件的具体分析中发现了不少失误，但我们要对这些失误的原因做具体分析：

第一，情报来源的失误与局限导致的情报分析失误。在本编文件涵盖的期间（1950~1966），中美之间正处于尖锐的冷战对峙状态，中美之间的官方乃至民间往来基本断绝，所以美国对新中国的认识主要依靠其庞大的情报系统。就本编收录的美国情报机关的对华情报报告而言，其情报来源大体上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种公开媒体的信息，如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等。这是美国情报机关在冷战期间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在本编的情报报告中被引用最多的是《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以及北京广播电台（即中情局所说的北平广播电台，现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其次是诸如《北京日报》、《河南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国的省级、地区级的报刊与政府各部委所办的报章杂志。第二类是得自那些赴中国旅行或访问的外国人士有关中国大陆局势的信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中美关系中的“传话筒”或桥梁角色，是美国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第三类是来自香港等地的中国大陆流亡者的报告。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就指出中情局通过雇佣中国难民与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做间谍，得到了有关中国“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的第一手报告，而这些有关中国内部混乱的情报才是有价值的。^①第四类就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如西藏叛乱分子在1961年对中国边防军的一次袭击中曾缴获了一批军内文件，而中情局对1960年“信阳事件”的分析就是依据这批解放军的机密文件。

如上所述，美国情报机关获取中国情报的来源如此广泛、复杂，加之其获取的情报与资料有限，所以其分析报告中的许多资料本身就很不可靠，因而制约了这些报告应有的深度与预见性。例如令人吃惊的是中情局对中共高层领导的个人情报掌握得既不准确也不全

^① James Lilley and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94.

面,这多多少少影响了其评估报告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如在本编 3-11 文件中,中情局掌握的有关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基本信息与实际出入颇大,最为可笑的是该报告对邓小平的介绍:“与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不同,邓的妻子从来没有与他一同露面。很可能,邓未婚。”不过中情局的专家们也坦承他们对邓小平的私生活实际上一无所知。

第二,情报分析自身固有的缺陷。情报的分析与处理受分析家们过去的经验、教育、文化价值观、角色要求、体制规范以及所获情报的特性的强烈影响,即所谓的心模式、心理定势、偏见或分析假设。^① 在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对中国大陆的分析中,有一个暗含的“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抑或“克里姆林宫学”作为分析中国的一个参照。^② 例如在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中往往把毛泽东比作晚年斯大林,或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比较,把周恩来比作米高扬等等。

此外,当美国情报界对中国不理解、不了解时,就自然会用他们自己熟悉的文化与知识架构来解读中国,难免不发生削足适履的情况。于是在中情局对中国领导层的分析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他们进行派系划分处理。虽然本编 3-11 文件指出有关中共内部的派别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推测的猜想,但那些情报分析员还是倾向于把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分为两派,即刘少奇与邓小平领导并得到毛泽东青睐的激进派(或曰教条主义者)与周恩来、陈云为首的温和派(或曰实用主义者)。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对新中国的偏见。在我们选出的这些篇章中充满了咒骂中共、恶毒攻击新生政权的言辞,更不用说诸如“共产党中国”、“北平”之类习以为常的政治歧视性用语了。

这些解密了的情报报告是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产物,是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关于中国政治领域的情报分析文本,固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当我们今天心平气和地透过“敌人的眼睛”来重新审视共和国曾经走过的风雨历程时,仍可以发现我们在内外政策上的诸多失误与所受的挫折,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以一种局外旁观者的姿态给我们指出诸多的政策失误与教训,其中有的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这些美国的情报报告或许是共和国历史的另一面镜子。

^① Richards J. Heuer, Jr.,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9, p. 4. 该书亦可从网上获得,网址为 www.odci.gov/csi.

^② 赵建民、蔡文轩:《中共精英政治的“结构-行动者”模式》,《中国大陆研究》第 29 卷,第 1 期,第 3 页。另外,Kremlinology 有时被译为“苏联问题研究”、“苏联政体研究”。